

西方信息经济学是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和肯尼思·阿罗等人的倡导下,信息经济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研究的一大热点,其影响渗透到经济学科的许多方面。本文试图阐明迄今为止西方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结论,并且对其理论观点和现实意义作初步评论。

迄今为止西方信息经济学尚未形成一个较为完备统一的体系,有关经济学家也是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使用不同的术语,着眼于不同的方面,因而信息经济学的文献给人以纷杂繁复的感觉。这里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综述。

一、信息的信息学范

信息论和控制论在本世纪发展起来的信息论和控制论中得到了深入的研究。然而将西方信息经济学理解为经济学和信息论交叉而成的边缘学科是不恰当的,因为经济学中的信息范畴和工程通讯意义上的信息范畴有很大差异。尽管如此,西方信息经济学还是在信息论和控制论中吸取了不少养份。信息经济学沿用于维纳关于信息是有序性的度量的观点,将信息定义为“不确定性的负测度”,即信息的增加意味着不确定性的减少。

西方信息经济学认为,经济决策是在不确定环境中进行的。由于信息能够减少不确定性从而有助于经济决策,因而具有经济价值。经济学中的信息量应该在这个意义上来测度。

但迄今为止仍提不出统一的信息量经济测度。这是西方信息经济学尚不能形成统一理论体系的主要原因。阿罗在1984年出版的《信息经济学》序言中指出:“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认识到信息具有经济意义上的价值并不是巨大的思想飞跃。然而,构建一个作为经济商品的信息的一般理论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同种类的信息迄今尚无被认可的共同单位”。目前西方经济学家通常根据具体问题来决定如何测度信息量。比如斯蒂格勒从信息搜寻角度研究市场交易问题时,就以买者的预期支出减少量来测算信息量。这种以使用信息的机会成本来计量信息价值量的方法比较普遍,但斯蒂格勒本人也承认信息度量“不是简单的机会问题”。

西方信息经济学将信息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来考察,得出了几个重要的结论:

第一、生产信息的投入要素包括人本身。由于人体器官接受和处理信息的生理局限,人本身被看作是生产信息的固定投入要素。因此,电子计算机等投入要素的增加固然能降低信息成本,但受到边际成本递增法则的制约。在利用信息进行经济决策方面,人是极其重要的因素。

第二、信息所有权是无法让渡的。信息的这一特征使得信息商品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有效生产。如果信息保密不可能,那么信息的市场价格必然低于生产成本,导致信息生产投资不足;如果信息保密是可能的,那将引起在信息生产方面过度投资。这两种情况都会破坏资源的最有效配置。

第三、同一信息的生产成本对于不同的人是不同的。一般而言,获得与他原来掌握的信息领域相近的信息,其成本较低。这里涉及到信息生产的专业化分工问题。

第四、信息成本与应用规模无关。某种生产技术的信息,可以在任何规模上用于生产。因此,同样成本的信息使大规模生产者比小规模生产者得到更大利益。信息的这一特

点被认为是刺激规模经济从而导致经济偏离竞争状态的重要因素。

二、不完全信息、经济主体行为和市场均衡 新古典经济理论有两大支柱,其一是经济主体最优化行为理论,其二是市场均衡理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就是在此之上建立起来的。根据这种理论,经济主体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按照某种目标作出最优选择,例如消费者在既定的价格和收入水平约束下按照自己的偏好选择最优消费品组合,生产者在既定的要素价格和生产函数约束下按照利润最大化目标选择最优的投入和产出组合。当不确定性被引入后,这里的每一个变量都被赋予一个概率分布,实质关系并未改变。很明显,这里隐含着完全信息的假定,市场上各种商品的全部可能的价格对消费者来说是已知的,各种要素价格和投入产出之间各种可能的组合对厂商来说也是已知的。市场上的买卖双方对任一时间某种商品的供求情况了如指掌,从而市场均衡价格的实现成为当然的结果。

信息经济学认为,完全信息的假定完全背离了经济现实。经济主体行为理论和市场均衡理论必须在不完全信息的前提下予以修正。从总体上讲,信息经济学主要在两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提出信息搜寻概念。信息经济学认为,经济主体所掌握的初始信息是有限的,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鉴于信息具有减少不确定性的作用,因而经济主体要作出最优决策,必须对所有有关信息进行搜寻;但是信息搜寻又是需要成本的,因此获得全部信息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存在着某种搜寻适度。经济主体并不追求目标最优化,而是追求目标适度优化。

第二、经济主体行为的约束条件不是既定的,而是可变的。经济决策所依据的信息不是一个恒量,而是一个变量,是可以创造的。例如消费者选择商品组合时,不仅依赖于商品及其替代品的价格,而且可以

西方信息经济学评述

许 斌

进一步依据过去的价格、数量变动信息乃至政府政策所创造的信息。这些信息本身也许没有多大经济重要性，但它帮助减少在预测其他观察不到的变量时的不确定性。信息经济学这一结论的重要意义，在于确立了非价格信息在经济主体行为理论和市场均衡理论中的地位，弥补了新古典决策理论仅仅考虑价格信息的缺陷。

西方经济学家运用上述观点对许多经济现象有了新的理解。例如斯蒂格勒从信息搜寻的角度重新探讨了市场价格问题，得出了与传统的市场价格理论迥异的结论。传统理论认为同质商品的市场均衡价格应该是一致的，实际存在的价格不一现象只是包括销售条件在内的产品差异性的结果。斯蒂格勒的结论是：即使是完全相同的商品，它们的市场价格也不可能一致。市场价格一定程度的离散是一种必然现象，因为买卖双方对随时变化的市场供求条件的信息是不足的，要随时得到有关信息需要进行大量搜寻。由于存在着信息搜寻成本，不同的买者和卖者关于市场供求条件的信息必然有所差异，而其决策是这种信息的函数，从而市场价格的离散是必然的。斯蒂格勒指出，如果卖者都作价格广告，那么价格差异将大大减少。但价格差异并不会完全消失，因为没有任何广告媒介能在某一时刻将价格信息传送给所有的潜在买者。最终的价格差异稳态据认为是某种市场均衡状态。

三、私有信息“市场失败”和资源配置 西方信息经济学在从信息角度重新考察新古典理论过程中所开辟的另一个研究领域，是私有信息引起的“市场失败”问题及其带来的资源配置后果。

前文已经提到信息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本身不能通过市场有效提供，而且刺激规模经济导致经济偏离竞争状态；前文还从信息搜寻角度修正了经济主体行为理论。这里着重叙述信息私有导致的两类“市场失败”。

根据西方经济理论，制定可执行的合同的能力是市场存在的必要条件。任何合同都有委托者和代理者两方。信息经济学认为，合同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代理者拥有委托者所没有的私有信息。私有信息可区分为两种类型：关于代理者本身特质(比如能力)的信息和关于代理者行为(比如努力程度)的信息。代理者为了使其自身得到最大好处，就有不把这些私有信息显示出来或者显示错误信息的刺激。这使得可执行的合同难以签订。对应于两种类型的私有信息，产生了两类“市场失败”问题，分别称为“不利选择”(Adverse Selection)和“道德危害”(Moral Hazard)。这两类问题最早是在研究保险合同同时提出的。在保险合同中，由于投保人不把自己的真实情况显示出来，使得保险公司不能根据不同的风险收取不同的保险费，而只能根据平均风险收费。于是，低于平均风险水平的人就不会去购买保险，而高风险者却加大购买量。这使得实际风险水平高于保险公司依据的平均风

险水平。保险公司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不得不投入人力、物力、财力从事信息收集活动，而风险又没有得到有效分散。这类问题即所谓的“不利选择”。另一种情况是，投保人改变通常行为从而改变投保的风险。例如在投保火险后减少了防火努力从而增加了火灾的可能性。保险公司缺乏投保人努力程度的信息，从而很难执行有效的保险合同。此即“道德危害”问题。这两类“市场失败”问题对于所有合同具有普遍意义。

西方经济学家从信息角度论述资源配置问题可以追溯到本世纪20年代所谓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当时奥地利学派的冯·米塞斯发表了著名的观点，认为资源有效配置的关键在于获得资源相对稀缺性的信息。市场制度能有效率地产生以市场价格为形式的信息，而社会主义制度下难以得到这种信息。以此论证资本主义制度优于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不久，哈耶克也从信息角度论证了自由制度是最优制度。他们将资本主义制度等同于理论上美化了的完全竞争市场制度，而将社会主义制度归为纯粹的集中计划制度，并且只从单一角度比较两个制度的优劣，显然是错误的。

西方信息经济学对这个观点作了很大修正。在认为分权经济能最有效率地传输信息的同时，强调信息的协调。信息经济学认为，信息具有互补性，为了更好地决策，必须使用某种信息集合，而纯粹市场经济难以提供这种集合。

四、不对称信息和刺激机制的设计 70年代以后，西方信息经济学的重点转到不对称信息下刺激机制的设计上，研究所谓的“委托-代理问题”(Principal-agent problem)。如前所述，经济代理者和委托者拥有不对称的信息，导致“市场失败”，使资源配置扭曲。于是自然产生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使经济代理者的行为最大限度地符合委托者的要求，从而使资源配置达到“次优”状态。

前文曾提到信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原理，即经济决策所依据的信息是一个变量，是可以创造的。经济代理者行为和委托者利益的协调问题，可以归结为设计某种信息机制的问题。近年来西方经济学家研究了不少诸如政府和垄断企业，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企业和职工，股东和经理之类的委托-代理问题，设计了许多复杂的刺激机制。限于篇幅，本文不便一一叙述，仅概括其基本思路。

不对称信息下刺激机制设计的基本思路是：委托者设计一种信息机制，使代理者的决策在依据原有信息的同时，必须依据这种新的信息。这种信息机制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能够使代理者隐瞒私有信息或显示错误信息的“欺骗”行为变得对其本身没有好处。也就是说，无论是欺骗还是不欺骗，代理者所得到的利益是一样的，从而他没有必要显示错误信息，其行为也就符合了委托者的要求。信息经济学称这种机制设

计原则为“刺激一致性”(Incentive compatibility)。

信息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结论是：这种“刺激一致性”信息机制虽然不能完全消除不对称信息所带来的资源配置的扭曲，但可以使资源配置达到“次优”状态。

二 西方信息经济学主要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弥补新古典理论的缺陷而发展起来的。与传统经济学“完全信息”的假定相比较，信息经济学关于“不完全信息”的假定显然更接近于现实，由此得出的一系列结论也比较符合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情况。西方经济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视市场制度为完美无缺的制度，信奉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法则，相信仅仅依靠市场价格信息就能实现全社会的资源最优配置。他们不但否认根本上决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矛盾运动，而且无视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和完全竞争的理论模式的表面差距。尽管资本主义经济中不确定性从而信息问题早就存在，并且通过加剧经济危机等方式表现出来，但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却毫无反映。直至本世纪2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中，信息的作用才第一次为部分西方经济学家所关注，但仅限于作为攻击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工具。直至资本主义经济本身也“不再是象过去那样的非集权制了”，信息才成为西方经济学本身的重要研究对象。信息经济学开始于对主张自由放任的新古典理论的修补，到最后成为建立一种包含政府干预的非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设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不说是西方经济学善于“综合”的“杰作”。但应该承认，西方信息经济学虽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矛盾运动，但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理解上毕竟向前推进了一步。

信息范畴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所特有的。信息在经济中担任重要角色是与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相联系的。西方经济学的许多部分实际上描述了社会化商品经济的某些运行机制。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使得信息经济学提供的某些政策处方的使用受到局限，例如通过信息机制协调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问题。同时，西方经济学错误的方法论本身也阻碍了信息经济学的健康发展。特别是企图通过模型的复杂化来重建一般均衡，使对一些经济范畴和经济机制的理解落入机械论的窠臼。西方经济学对“非瓦尔拉斯均衡”的追求最终很可能成为又一项“重要的智力成就”而使经济运动的内在规律得以掩盖。

西方信息经济学的缺陷并不能掩盖它所具有的丰富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启示。特别是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商品经济现象，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建设以及有计划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1) 新的角度和方法的开辟 西方信息经济学的最大意义与其说是创立了一门新的经济学科，勿宁说是开辟了一个新的角度，引进了一种新的因素，尝

试了某些新的方法。这种新的角度和方法无疑应该引入社会主义经济学中。东欧的某些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比如奥斯卡·兰格，曾经建立起若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模式。然而这些模式往往隐含着完全信息前提假设，其实践意义受到很大限制。近十几年来，亚诺什·科尔纳在引入信息范畴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信息这个词近年来频繁出现于我国的报刊杂志，但大多与信息社会、信息产业等联系在一起，而将信息范畴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变量的研究甚少。事实上，如果我们将信息搜寻、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等范畴引入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中，那么许多结论同样需要改写，许多经济规律会取得更加切合实际的表现形式，我们对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解会加深一步。

西方信息经济学从信息角度研究经济现象的方法产生了广泛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比较经济学在70年代创立了所谓DIM(决策、信息、动力)方法，使比较经济制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此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将诸如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以及耗散结构、突变理论和协同学之类现代科学的某些范畴和方法加以改造并应用到经济分析中，可能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

(2) 市场机制的再理解和政策思想的启示 西方信息经济学有助于我们对市场机制的进一步理解。不完全信息、不对称信息等范畴的引入使得市场机制某些部分的运转失灵。它提醒我们在强调市场机制积极作用的同时，不要忽视“市场失败”的研究。在经济承包制进一步推广的情况下，尤其要注意“不利选择”和“道德危害”等问题。信息经济学讨论的委托-代理问题，对于处理好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关系具有普遍意义。

西方信息经济学的一些研究结论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某些商品经济现象。比如斯蒂格勒关于同质商品由于信息搜寻成本的存在其市场价格必然离散结论告诉我们，没有必要追求同质商品市场价格的绝对整齐划一，市场价格一定程度的差异是必然现象。

对于建立社会主义间接控制手段极富启发性的一点，就是信息经济学提出的通过“刺激一致性”机制使经济代理人的决策符合委托人要求的思想方法。这种类似于中国古代大禹治水的疏导方法，可以说是经济控制的上策。在处理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时，如果能设计出有效的“刺激一致性”机制，使得个体决策能够最大限度地符合总体目标，那么就有可能使全社会的资源配置达到可以争取到的最有效状态。

(摘自《世界经济文汇》1988年
第5期。全文9000字)